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新时代党员干部 政德修养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理路

崔 翼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党性追求的崇高理想和高尚人格是一种大格局、大境界、大智慧,其所促成的党员干部修养方式是一种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实践过程,既内在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公与私辩证统一的系统性推进模式,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养功夫紧密关联。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所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是与新时代政德修养的实践范式相适应、相协调的内容,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对传统政德修养方式的“扬弃”。在大德党性涵养层面,汲取“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历史智慧,是推进新时代党员干部涵养党性大德的重要路径。在公德意识培养层面,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积极汲取儒家“治世平天下”的文化智慧,从其中汲取丰富的伦理养分。在个人私德提升层面,有必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为之注入新的时代活力,推动新时代党员干部实现从“要我慎独”向“我要慎独”的思想转变。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提出深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大德—公德—私德”实践理路,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有助于提升政德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贡献了智慧。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政德修养;历史智慧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1-0016-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102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常态化、制度化的实践样态,推动着新时代党员干部以党的宗旨信念为指引来涵养政德、提升党性。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是循序渐进的实践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曾借助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对此加以阐述:“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1]175}对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不仅是宏大且深邃的历史资源,同时“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99},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所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必须是与新时代政德修养的实践范式相适应、相协调的内容,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对传统政德修养方式的扬弃。

“第二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干部政德修养提供了坚

收稿日期:2025-09-10

作者简介:崔翼,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21CDJ00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D202537)。

实文化根基与深厚历史底蕴。科学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政德修养智慧,并实现其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深度结合,提出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的实践理路,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纵观学界的研究现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党员干部政德修养的研究:一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提出解决党员干部党性修养问题的“三位一体”式的方法论,即制度保障、理论学习、实践养成^[3]。二是通过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考察,间接阐明党员干部政德修养的基本内容^[4]。三是论述党员干部政德修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比如有的学者研究新时代政德建设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5],有的学者则着重论述儒家“四端”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6]。总体来看,目前学界的论析集中在宏观层面,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如何嵌入并塑造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这一微观实践领域,其内在机理与实践理路尚未充分展开。因此,本文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着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与党性涵养、经世致用和修身自律相契合的核心理念,提出深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因子的“大德—公德—私德”实践理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历史智慧、儒家“治世平天下”的文化智慧和“慎独”思想资源,使其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有机关融入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助于提升政德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一、大德党性修养:新时代党员干部汲取“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历史智慧

党性修养是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涵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党性追求的崇高理想和高尚人格是一种大格局、大境界、大智慧,其所塑造的党员干部修养方式是一种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修养过程,既内在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公与私辩证统一的系统性推进机制,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养功夫紧密关联。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集中体现的是大德涵养的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8]26}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新时代党员干部在道德涵养中往往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呈现出追求“大境界”与弱化“微实践”的矛盾。因此,以“第二个结合”为遵循,汲取“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历史智慧,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涵养党性大德的重要路径。

(一)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中的“不矜细行”现象

党性修养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基石。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中必须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入手,以实际行动涵养大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9]122}。但在实际工作中,党内存在着小节失守、言行不谨的“不矜细行”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够谨慎、不够规范、不够自律,缺乏对小事小节的严格约束,不仅影响自身的政德水平和政治形象,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 and 良好声誉。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中的“不矜细行”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与改进,就会“终累大德”,损害自己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甚至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回溯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正是从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等“细行”方面的放松开始,逐步蜕化变质,最终因巨额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而被依法严惩,成为反面警示的典型案例,其教训极为深刻。

政德水平和政治形象是一个党员干部的重要政治素养,是党员干部赢得人民群众信任与尊重的前提。言谈举止是人的外在彰显,也是人的内在品质的外显。党员干部的言谈举止如果不规范、不自律、不慎微,就会造成自己的行为失范。如果党员干部在小事小节上出现偏差,就会损害自身的政治品格和

道德素质,更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中“不矜细行”的现象是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亟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充分借鉴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的历史智慧,加强自身的道德涵养,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由“四端之心”到“大德涵养”:党性修养在心性层面的发端和成长

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是连接“大德”与“细行”的内在心性修为,对推进新时代党员干部大德涵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孟子·告子章句上》提出“四端之心”,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0]172}这四种心分别对应了“仁义礼智”四种美德,是内源于心的道德情感^[11]。“四端之心”是党性修养的内在动力,是实现“大德涵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遵循,是现实层面的“细行”在心性上的发端。“四端之心”能通过教化、修养、发扬等方式,逐渐成长为高尚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党性修养,在长期革命与执政实践中自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德文化的智慧,发挥“四端之心”在涵养政德方面的关键作用,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是具有深厚“恻隐之心”的人民领袖,他对中华民族苦难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刻牵挂,对革命同志和国际友人的真诚相待,在国内外赢得广泛的尊敬与爱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担军事指挥失误的责任,作诚恳的自我批评,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检视自身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将“辞让恭敬”律己待人之道理运用于党内同志教育,强调对待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既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置之不理的态度,也不能对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同志搞“无情斗争”,主张在党内开展坦诚对话,同时注意方式方法的斗争。邓小平同志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是与非”作出精准判断,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彰显了把握历史大势的政治智慧。新时代优秀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党性修养的优良传统。被誉为县委书记榜样的焦裕禄,其“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是“恻隐之心”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中的生动体现。孔繁森同志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西藏建设,深刻诠释了“义之端”所蕴含的崇高价值追求。实践证明,党员干部不应是空有崇高理想的空想家,也不应该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应是能够将“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12]129}起来的人。

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与党员干部涵养“大德”以及关注日常“细行”之间看似相互独立,实则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第一,“四端之心”是党员干部“明大德”的道德源泉。在“仁”端,党员干部需要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义”端,要求党员干部要有“道义之心”,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礼”端,强调党员干部应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在“智”端,要求党员干部具备政治智慧与前瞻意识,能够从大局出发作出科学决策。第二,“四端之心”能引导党员干部规范日常生活的“细行”。“仁心”促使党员干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小事”,“义心”推动党员干部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礼心”要求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道德底线,“智心”帮助党员干部善于在复杂的具体事务中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涵养大德”是党员干部注重“细行”的最终目标。孟子“四端之心”的积极价值,不仅体现在党员干部对政德的认知层面,更体现在行为层面。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13]卷六,208},党员干部唯有在日常生活中重视小事小节,才能真正实现“明大德”。

(三)在见微知著中走向“知行合一”: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涵养的实践智慧

见微知著对党员干部而言,是一种智慧、一种方法、一种境界。“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14]661}

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内在规律,透过观察事物运动变化中的微小迹象,能够洞察到事物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势。新时代党员干部应着力掌握见微知著的智慧,通过把握事物变动的“几先之兆”,洞察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在工作中注重细节、务求实效,唤醒发端于内心的纯良心性,在涵养大德的过程中“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15]224},以实际行动彰显党性修养。

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道德涵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党员干部需持续学习与实践,遵循知行合一的方法“致良知”。“共产党人的‘良知’就是党性”^[16],党员干部要在实践中增强自身党性修养与实践智慧。第一,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小事小节上必须心存敬畏,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锤炼党性修养,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日常小事小节是反映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镜子,只有“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才能“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17]。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落实到为群众办实事中,若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仅停留在“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18]292},便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二,新时代党员干部个体在言行举止上必须谨言慎行,做到慎初、慎独、慎微,时刻自重、自省、自律、自警、自励,严守政治纪律,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党性修养是每个党员干部终身的“心学”课题,“不虑于微,始殆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19]171},党员干部个体的一言一行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正是基于他们对党员干部日常的“细行”的观察。第三,党员干部个体在知行合一中培育“君子人格”,增强共产党人的道德责任感,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君子作风,既要体现在为人方面“做到功高不自居、名高不自誉、位高不自傲”^[20],也要表现在处事方面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政治立场,在细枝末节上守住道德底线。

二、公德意识培育:新时代党员干部汲取儒家“治世平天下”的文化智慧

近代以降,梁启超、梁漱溟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公共精神,“中国之五伦则惟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21]13}。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关系伦理型社会治理学说,内蕴着区别于西方政治性公民道德的本土性社会公德。儒家道德思想既涵盖指向修养功夫的个体维度,更具备“胸怀天下”和“经世致用”的社会维度。儒家提出“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等思想,强调为政者必须以百姓福祉为本。在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因地制宜、精准帮扶,生动彰显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治世”精神。黄文秀等一线扶贫干部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脱贫事业,正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精神在当代的深化和生动诠释。新时代党员干部要自觉汲取儒家“治世平天下”的文化智识,必须从其中汲取丰富的伦理滋养,更加坚定地践行初心与使命。

(一)“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思想对培育党员干部公德意识的时代价值

第一,儒家“仁学”思想的合理内核为党员干部在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情感根基与价值导引。“仁”始终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范畴,既具有指向个体身心和谐的“内发性”,又蕴含着由己及人、仁民爱物的“外推性”。“仁”所具有的“外推性”要求处于差序格局中的人要互相关爱、推己及人,但这并不代表要无原则性地、无党性地对每个人施以“仁爱之心”。“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22]69},真正怀有“仁心”的君子能够辨忠奸、识善恶、明是非、守底线。党员干部要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传承与发扬儒家“仁”的思想要旨,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必须自觉珍惜自身的名声与形象,常态化地开展自省、自查、自检,以严格的党规党纪规范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

第二,修习儒家“义”的思想能够唤醒党员干部的“羞恶之心”,使党员干部在运用公权力的时候能够正确把握“义”与“利”关系、坚守义利底线。“义”的思想不仅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恰当适宜,而且要求人们在获取利益的同时恪守道义原则,在提高自身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心系苍生、服务人民,以忧国之情、忧民之心推动实现社会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必须在行使公权力之前首先判断事情是否合乎“道义”,所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23]65}。为了使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不至于衰减,党员干部必须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持续不断地做合乎“道义”的事情,“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23]65}。

第三,学习儒家“礼”的思想不仅有助于规范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交往方式,而且有利于在外交领域的党员干部彰显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礼仪精神。“礼”的实施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和谐、有序、稳定的社会秩序。遵守党规党纪是新时代发扬儒家“礼”的精神实质的题中应有之义,严守政治纪律、牢记政治规矩、坚守优良作风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行为上践履形式之“礼”与实质之“礼”辩证统一的过程。在国际公共交往领域,汲取儒家“礼”的思想精华的党员干部,不仅在国际上表现出彬彬有礼的言谈举止,其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展示的外交辞令,更是生动彰显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和合”精神,提升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蕴与国际影响力。

第四,学习儒家“智”的思想能够给予党员干部通透的视野与清醒的认知,帮助其在具体的政务中顺历史大势而动、凝历史合力而为。党员干部要在顺应人民至上的治国理政之道的基础上,传承与弘扬儒家“智”的思想精髓,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既要有审时度势之“智”,又要有心怀“国之大者”的崇高理想。要遴选出真正愿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党员干部,就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检验其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的成果。新时代党员干部治国理政“智慧”的增长,依赖于学习与实践之间螺旋形上升式的良性互动,离不开理论素养的提升与基层实践的锤炼。

第五,新时代党员干部能否在关键时刻凝聚起人民群众的力量共同应对风险挑战,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口碑,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带头自觉守住“诚”之底线、践行“诚”之准则。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之者,人之道也。”^{[23]185}天与人的关系依靠“诚”得以互通,“诚”既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根本准则。人的真诚体现为不欺骗别人和不欺骗自己两个方面,核心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党员干部要从维护政党形象、树立政府公信力的高度,传承与弘扬儒家“诚”的思想精义,将“诚信”意识贯穿于党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党员干部只有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敢于担当的负责态度、言行一致的为民情怀,才能真正地取信于民、凝聚民心。

(二)“温良恭俭让”:党员干部公德意识培育汲取儒家“君子之风”的思想滋养与实践路径

“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者身上鲜明的个性品格,同时也是为政者应该具备的风度气象与执政素养。子禽曾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回答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24]6}“温良恭俭让”的风范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凝聚社会共识,是儒家君子人格的核心特质。新时代党员干部要汲取儒家的五种“君子之风”,将其深度融入各项工作之中,并努力实现其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儒家认为,一个人的温良品性主要表现在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表现出的善意、理解和宽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善待他人的精神,这是一个人为社会作出贡献、与他人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钱穆指出,“人心之仁,温然爱人,恪然敬人”^{[25]274},爱人需要饱含平和的情感,既不能过于炽热,也不能过于冷漠,党员干部要从三个方面汲取儒家温良思想的精髓,灵活运用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事务

中。第一,人民群众能够将直接感知到的党员干部形象投射为政党形象,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温良与宽厚的政治形象。第二,党员干部在制定公共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调研、实事求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适中合宜”的目标。第三,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应该秉持儒家的“温和之道”,在多方利益诉求下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利益的公正分配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儒家看来,“良善”可以理解为“良而易直,无一些矫饰”^{[26]64},核心是真诚无畏、坚守本心。此外,“良善”一词具有更深层次的公共意蕴,这意味着以儒家“良善”的思想指导行政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实可行的。新时代党员干部是全社会道德风貌的重要塑造者和传播者,他们所负载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党员干部在作任何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时必须对得起党员干部的身份、对得起自身的良知、对得起历史赋予的重托。党员干部不仅要考虑其制定的公共决策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要考量公共决策是否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多的善,能否激发人民群众光明之心、易直之性。

无论在个人的品德修养,还是在社会的伦理秩序构建方面,“恭而庄敬”的思想经由儒家的演绎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儒家认为,恭者,无过于尊人,尊人就是尊重别人;庄者,修身养性;敬者,待人以诚,待己以严。“恭而庄敬”的儒家思想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指引。真正的领导力并非简单的以管理职能为后盾,而是始自人民群众真心地拥护。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以“恭”的姿态与人民群众相处,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倾听群众心声,在谋事成事的过程中以“敬”的态度承担起应担负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对公共事务的敬畏之心与谨慎态度。

儒家“节俭”思想的基本内涵是以节约和厚道为基础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原则,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勤俭节约,而且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对欲望的约束和厚道的实践。儒家认为,节俭的主体不只是个人,还包含社会、国家等。《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27]225} 传统社会积累财富的方法在于“量入而出”。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理解和实践儒家“节俭”思想,行节俭之道,实厚德之质,不仅是个人修身立德的内在要求,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现实要求,更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体现、弘扬优良传统作风的体现。

“让”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自古至今,其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让”一词具有厚重的道德意蕴与伦理价值。“让”所表述的是一种对他人的敬重、对事情的审慎、对权力的谦逊,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追求与处世智慧。“让”亦象征着一种社会规范,使人们在互动中能顺利达成共识,化解冲突,共同构筑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新时代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让”的精神实质,“让”不仅是表面的取舍和牺牲,更重要的是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通过将儒家“让”的理念融入公共决策中,形成一种“谦让型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在现代公共事务中演绎儒家“让”的思想的文化形态之一。在社区共同体中,党员干部以“让”为核心理念,倡导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中探索以公民参与、社区自治为基础的社区服务新样态。

(三)“恭宽信敏惠”:儒家“为政以德”思想对培育党员干部公德意识的现代启示

第一,儒家关于“恭”的思想对新时代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具有现实启示。孔子在评价子产时认为他有四种品性符合“君子之道”,其中之一就是“行己也恭”^{[24]46}。新时代党员干部应该端正自身的言行举止,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发扬刀刃向内的斗争精神,克服党内急躁、浮躁、烦躁的情绪,以恭敬有礼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孔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24]8} 恭敬的姿态符合礼的精神就能够避免被别人的侮辱,但也不能过分地恭敬,“足恭”会丧失恭敬本身的价值,最恰当的方式是“致恭而中其节”^{[22]52}。党员干部要深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的本土经验,但当觉察到一些人的某些错误想法时,必须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

第二,儒家关于“宽”的思想对新时代党员干部进行社会治理具有现实启示。儒家谈到的“宽”的思

想,在国家治理方面指向的是“宽政”,加强对人的道德教化。儒家提出的“御众以宽”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对下级的态度应该坚持宽而有度、宽严相济的原则,切实保护与关心,但不能放任其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员干部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察人民群众的意愿,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划出“不可为”的范围,这便是儒家提倡的宽而有界、宽而适度的精髓所在。

第三,儒家关于“信”的相关论述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塑造政府权威具有现实启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24]199}君子要成事,首先要取得他人的信任,信任是成事的关键和前提。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与信任,对待人民群众要言出必行、言而有信,“信则人恃之”^{[28]325},承诺过的话就一丝不苟地去做,做过的事情要坦诚公开、毫不掩饰地向群众说明。

第四,儒家关于“敏”的相关论述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形成正确政绩观具有现实启示。儒家认为,为政者要拥有道、德、仁、义四种素质,才能真正治理好社会、管理好国家、教化好人,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4]66}。孔子认为,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4]46}的品质让其得到“文”这个谥号是无可非议、当之无愧的。由此可见,真正勤勉好学的人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在工作中要继承“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发扬“敏而好学”的精神,始终勤勉政事、夙夜在公,碰到任何挑战都能够凭借钉钉子精神加以克服。

第五,儒家关于“惠”的相关论述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现实启示。孔子讲,尊崇五种美德构成从政的必要条件,其中第一种德行就是“惠而不费”^{[24]208}。善于治理国家的当政者不会耗费本国的财力,反而懂得“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29]。孟子认为,得民心之道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22]180}。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常想人民所想、常思人民所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富国强国的基础在于民富,党员干部必须一心扑在人民的公共事业上,而不是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对于“可与取,可以无取”^{[22]296}的利益必须懂得放弃,以免陷入不义不廉的境地。我国正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儒家“惠”的理念在当代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实践。

三、个人私德提升:新时代党员干部对传统“慎独”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为衡量个人修养的重要尺度,“慎独”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在政德修养实践中,渗透在党员干部的每一个决策和行为之中,无论是对权力的慎用,还是在面对物欲诱惑时的自我约束,“慎独”理念都能成为实现私德提升的内在动力。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私德建设亟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资源的思想精髓,把握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30],并在此基础上为之注入新的时代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新时代党员干部实现从“要我慎独”向“我要慎独”的思想转变。

(一)8 小时外监督难:党员干部的“慎独”难题

“慎独”的实质是一种自我驱动的道德自律力,是个人在独处无人监督时,仍能坚守道德准则、恪守内心信念的自觉实践^{[31]22},它能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与政治信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道德自律力是内化于心的党性原则的体现,是经常对自我进行党性教育与自我革命的结果。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冲击下,党员干部保持这种自我约束与道德操守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外部监督体系虽然构成了党员干部日常行为和职业操守的有效把关者,但即便有着严密规范的外部监督,也无法全时

全刻覆盖党员干部的个人生活,尤其是8小时外的私人空间与家庭时间。在工作场域之外,党员干部的行为自由度大大提升,外部监督的缺失使他们的道德操守与行政伦理更多依赖于内在的自我约束。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党员干部是否仍能保持高标准的操守和自律。这不仅是对个体道德的考验,更是对党性教育有效性的检验。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有必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的精髓,使其在外部监管体系以外的时刻、在私心杂念萌生之际,“让党性占据心灵的空间,使不良欲念无处存身”^[32]。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资源的政德修养价值

为进一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何以影响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首先需要结构性澄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的思想要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文化融入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私德建设的实践方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慎独”思想的理解,应放在“大历史观”视野中展开。随着湮埋已久的文献史料的陆续出土,被遮蔽的“慎独”思想的原旨原义逐渐开显,但并不意味着部分儒者对“慎独”思想的解释是无中生有;恰恰相反,其诠释出的某些含义,正是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发展的真实文化镜像^[33]1-7。“慎独”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层次:慎其身、慎其心、慎其行、慎其德。

在马王堆帛书《五行》与郭店竹简《五行》面世之前,郑玄关于“慎独”的注解长期以来被奉为主臬^[34]。在他看来,“慎独”一词应该置于“闲居”这一空间意义上的独处状态来理解^[35]。朱熹将“慎独”里的“独”解释为“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22]7},此时的“独”指向的是人的内心之“独”,这正是“慎其心”的要义所在。内心之“独”要求在个体层面展现出自我约束的道德自觉,更要在“心”之“未发”与“已发”之际,始终保持慎隐慎微的态度。无论是“慎其身”,还是“慎其心”,都不应该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看待。朱熹曾作出“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22]7}的论断,认为外在行动举止正是“心诚”的具体表现。“身一心一行”关系在“诚”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机统一,这意味着郑玄、刘向等儒者在独处意义上讲“慎其身”有其合理性,但真正的“慎独”精神,应理解为无论是否有监督、有无他者在场,始终保持内心的专一不二,不欺心、不欺己。

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中,“慎独”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道德哲学与生活方式,已然成为中华优秀修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德的角度看,政治主体的品格构成了执行公务能力的重要人格基础,而政德修养则是对这种品格的培育与完善。“慎独”理念为政德修养提供了道德自觉与自律的原则,需要时刻自省、自警、自律,坚守高尚的道德行为和纯洁的思想情操。“慎独”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在身处高位时要谨言慎行,而且强调“在无人监督的情境中,也能加强道德自律、心存敬畏”^[36],时刻“慎其心”,坚守党性原则,做到不越轨、不逾矩、不贪婪。

(三) “吾日三省吾身”理念的当代实践

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来说,“吾日三省吾身”这一理念并非已经过时的“思想遗产”,其在今天仍然是指引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修养与坚定理想信念的道德律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37]376}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中,如何将“吾日三省吾身”这一古老的自省理念融入党员干部的当代实践中,成为提升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水平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马善祥,是新时代重庆党员干部中以自省促党性、于细微处践初心的鲜活榜样。作为一名扎根基层30余年的老党员,他将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智慧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要求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老马工作法”,其核心就是在每日工作、每件小事中持续反思、锤炼党性。马善祥有个坚持了数十年的

撰写《工作笔记》习惯,记录调解案例、分析得失、总结心得,笔记已积累超过 900 万字。他通过笔尖的“自省”,反复审视自己在处理群众矛盾时是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是否带着深厚感情、方法是否恰当。

第一,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善于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时时刻刻反躬自省,反思自身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党章党规党纪的要求,以及自身的理想信念是否在多元思潮的冲击下仍然坚定不移^{[1]134}。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强身健体的重要法宝之一,“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像‘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38]180},经常清除有害于政党肌体的“灰尘”和“微生物”,有利于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涵既蕴含着自我反省的内容,亦包含着“‘教人以善’的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警示的含义”^[39]。通过不断批评和自省,党员干部能够进一步内化组织的纪律规范,形成一种自觉遵循和拥护党组织决定的行为习惯。

第二,推动构建自查自省、互查互警的常态化反思制度。这一制度的创设代表着一种政治生活态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优化决策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成为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实际举措,自我批评的目的是更好地为党分忧、为民尽责。党员干部通过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思,实现了思想、能力、作风与行为的提升,在无人监督之时能够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40]。

第三,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自省的实践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行为体现,不仅要求在工作中保持清正廉洁、勤政敬业,而且要求其在工作之外保持高尚道德修养和健康生活情趣。新时代党员干部应把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刻领会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理念的深远内涵,将其与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形成自觉的内在驱动力,时刻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反省,养成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习惯。正所谓“身传重于言教”,党员干部理应以身作则,成为廉洁自律的模范表率。

四、结语

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同时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为政之道”“为官之要”“为人之德”理念,这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底蕴。从毛泽东同志救国救民的革命实践,到邓小平同志强国富民的改革决策,再到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共同延续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41]46}。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指出,共产党员要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任”,需要始终如一地“养心”,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锻炼自身的修养,保持大公无私的赤诚状态,纵使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管的时候,仍能够“慎独”,经得起检验^{[42]47}。党员干部个体的政德修养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人性既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也能动地改变社会关系。党员干部个体的政德建设并非脱离社会关系的单纯德行自持,而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道德作风建设的重要基础。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对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蒋英州. 理论、制度、实践:解决党性修养突出问题的方法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系统研究[J]. 西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12,211.

[4] 张晋宏,李景平. 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探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34.

[5] 牛绍娜,徐甄妮. 红色家书与新时代政德建设[J]. 重庆社会科学,2020(9):17-24.

[6] 周宏宇. 儒家修身“四端”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98-102.

[7] 习近平.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知,2023(5):4-10.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编写组.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0] 孟子[M]. 杨伯峻,杨逢彬,译. 长沙:岳麓书社,2021.

[11] 郑济洲.《孟子》“乃若其情”章“情”字释义与发微[J].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3(4):36-38.

[12]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 周易今注今译[M]. 陈鼓应,赵建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5] 王阳明. 传习录[M]. 叶圣陶,点校.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16] 宋朝,曾磊. 探索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政德建设新模式座谈会综述[J]. 孔子研究,2021(2):157-158.

[17]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N]. 人民日报,2022-03-02(1).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 伍新林,何绍辉,姚选民. 修身立德:中华传统修身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J].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0] 任广峻,刘克运. 儒家君子人格与新时代党员党性修养研究[J]. 党史博采(下),2021(5):40-42.

[2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2] 朱熹. 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 孟子译注[M]. 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4] 论语译注[M]. 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

[25]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6] 张居正. 四书直解[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27] 大学·中庸[M]. 林宇宸,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21.

[28] 李榕阶. 论语孔门言行录[M]. 陈鸿钧,整理.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

[29] 三浦国雄.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M]. 李若愚,张博,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30] 靳诺.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N]. 人民日报,2023-03-21(1).

[31] 梁涛,斯云龙. 出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慎独问题讨论集[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32] 李涛,肖恩玉. 传统儒家的慎独思想与新时代党员的党性修养[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1(5):102-107.

[33] 赵春燕. “慎独”俗解与儒家修身人格观念的历史衍变[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5):1-7.

[34] 商晓辉,谢扬举. 从马王堆帛书《五行》看荀子慎独思想[J]. 甘肃社会科学,2017(4):6-10.

[35] 詹海云. “慎独”观念的起源与发展[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5-13.

[36] 燕霞. 中华传统美德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论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8):143-150.

[3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8] 张艺兵. 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39] 鄯爱红. 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政德思想的继承与创新[J]. 新视野,2018(4):29-34,40.

[40] 杨怡莹,薛忠义. 从“三个统一”深理解中共党人的初心使命[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S2):249-251.

[41] 甘阳. 通三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2]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Moral Cultiv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Cui Yi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lofty ideals and noble characters pursu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erms of Party spirit represent a grand vision, a high realm, and profound wisdom. The cultivation methods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hat it promotes are a gradual and persistent practical process. This process is not only inherent in the systematic advancement model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ublic and private virtues, namely “cultivating great virtue-observing public virtue-being strict with private virtue”,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oneself-regulating the family-governing the state-pacifying the world”.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morality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new era must draw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morality culture in a manner that is compatible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practical paradigm of political moral cultivation in the new era.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t should achieve a ‘sublation’ of traditional ways of moral cultivation. At the level of cultivating great virtues in Party character, 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wisdom of “not being meticulous in small deeds, ultimately harming great virtue” becomes an important path for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great Party virtues among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new era. At the level of fostering public morality awareness,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new era must actively draw on the cultural wisdom of Confucianism’s “governing the world and bringing peace to all under heaven”, from which they can obtain rich ethical nourishment. At the level of improving personal private mor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absorb the essenc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prudent solitude” and on this basis,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it, promoting a shift in mindset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new era from “I must be prudent in private” to “I want to be prudent in priv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 practical approach of “great virtue-public virtue-private virtu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thought factors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proposed. This not only clarifies the main content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new era to cultivate their political morality by drawing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political ethics, which helps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tical mor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wisdom to advancing the Party’s self-reform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Key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virtue culture; political virtue cultivation; historical wisdom

[责任编辑:左福生]